

数字时代的 脱钩现象

倘若没有多边合作，全球数字经济恐将土崩瓦解。
届时，我们所有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丹尼尔·加西亚·马西娅和里希·戈亚尔

科技战正在成为贸易战的新形式。

在为争夺未来科技主宰权的竞赛中，美国与中国之间开展的竞争，已使多国出台了针对5G网络技术、半导体、社交媒体平台、基于数据的安全应用程序的进出口禁令。各国还针对存在安全风险的外国科技公司实施了金融市场准入限制。数字服务领域的贸易自由化正在让步于日益严苛的限制措施（见图表）。

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竞争态势升级没有丝毫意义。在传统行业，贸易壁垒通常会降低所有相关国家的经济福利。原因在于，贸易壁垒会成为国家走上高效、专业化道路的障碍，限制市售商品种类的多样性。

然而，在数字时代，如果谁能够在新兴技术领域占得先机，也就意味着，它可以坐收巨额利润、占据全球市场份额，为行业制定标准。人工智能、下一代5G网络、物联网、量子计算等构建在数据之上的新兴服务，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并且有望

颠覆整个行业，提高生产率。新冠疫情加快了全球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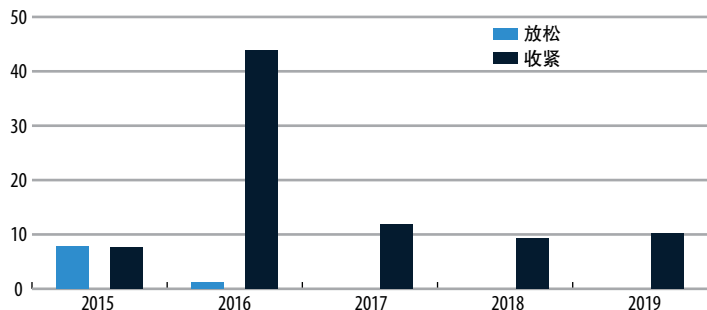
“赢家通吃”深植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基因里，在这一巨大利益的诱惑下，技术领先地位受到了全球各国的高度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里，少数高效企业和创新型取得了行业主导地位，并赚取了巨额利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和经济体内，但在数字行业尤为严重。

然而，传统的边境和知识产权保护，在各方争夺数字技术行业领导地位中已不再适用。网络经济使人们能够无缝触达全球各个角落，收集信息并做出决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但反过来，互联网上的小偷、破坏分子和间谍也会利用网络开展窃取、复制、操纵或破坏互联网信息等活动。数字化和互联互通在加速知识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威胁。

数字贸易壁垒

近年来，在数字服务领域，贸易限制措施已经取代了贸易自由化。

(出现政策转变的国家的GDP占比，百分比)



Source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d authors' calculations.

注：样本包括经合组织国家和八个非经合组织大国。

迈向新的科技秩序

除非是在冲突和犯罪活动主导的地区，否则，一般情况下，宏观经济学家看待安全问题的方式明显有别于经济问题。他们会在很大程度上将产权保护的制度基础和军事问题与经济政策分析区分开来。但网络空间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即没有有效的国内规范，也不存在公共执法机构，如“电子警察”或“电子司法系统”，更不存在缓和局势以及维护和平的国际机制。

在数字时代，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实现了互联互通，但这种关系也模糊了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的传统边界。数字时代的互联互通，既是国家经济的增长引擎，又是国家安全风险的滋生渠道，它激励各国政府联动用贸易和产业政策等经济政策工具，以保障更加广泛的安全利益或地缘政治利益。

我们也因此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一国在什么情况下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才有意义？这对其他国家又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国家又该如何应对？哪些政策和制度可以阻止这类冲突？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一份工作文件中，我们发现，有些标准答案已经不再适用于数字时代的全球经济形势（加西亚·马西娅和戈亚尔，2020年）。巨大的市场力量是由规模经济、技术流动和安全风险驱动的——当考虑到数字部门的这些关键特点时，进出口禁令的出台从单个国家视角看是具有其合理性的。然而，这些禁令会对全球其

他国家和地区造成不利影响。

从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倘若一个国家拥有一家潜在可行的供应商，那么它禁止技术进口的主要动机就是将外国公司获取的垄断利润收归国内。网络安全漏洞只会增加禁止进口的外国技术的吸引力。但进口禁令可能会阻碍技术流入，且只有掌握先进技术知识的科技强国才想实施技术禁令。这种结论并不新鲜。贸易经济学家早就指出过，进口禁令会对垄断行业有利。

研究中，我们还得出了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新发现：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出口禁令也有可能对单个国家产生有益影响。原因在于国与国之间的技术竞争是动态发展的。新的竞争者利用国际技术传播和国内规模经济，可使原来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在竞争中败北，成功取代后者成为全球生产者并坐收垄断租金。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结果，减少与之相关的网络安全漏洞，在某一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家可能会通过出口禁令来实现这一目的。

倘若某一个国家针对他国实施了贸易禁令，那么，他国就有可能针对禁令采取反制措施。尽管进口禁令有助于技术强国在全球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但竞争对手也可能针对禁令采取反制措施，进而造成两败俱伤局面。多数情况下，一国会认为对方会采取同等的反制措施，因而往往不会实施贸易禁令。

与进口禁令不同，出口禁令无法通过贸易政策进行反制。无论技术弱国作何反应，都不妨碍技术强国针对他们实施出口禁令。因此，在分散化的国际竞争局势中，这种对立关系会更加难以缓和。

合作才是正道

这些研究发现令人深省。对于单个国家而言，推出贸易禁令可能会比沿用自由贸易政策的收益更大。但它们也切断了其他国家获取数字技术的渠道，致使国与国之间脱钩，割裂成独立的经济孤岛，低效运行。而当盟友国纷纷效仿时，全球的经济

成本都将放大。我们应该督促科技领先国家在多个领域建立合作框架。

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实现知识产权的跨国保护。最低执行标准要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减少人们对技术滥用、技术强制转让或技术窃取行为的担忧，从而削弱技术强国推出出口禁令的动机，给技术的长期传播培养土壤，增加全球福利。在制定全球标准时，我们首先应该从加强特定领域的合作开始。以金融行业为例，各国共同制定的金融数据交换国际标准，为支付服务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同时，还要针对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往来制定明确、透明、统一的规范。如果政府与国内网络技术公司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目的开展合作，包括监督目的，就应该对这种合作予以明确限制。

另外一个相关领域是网络安全。互联网出现后，随之而来的是跨境网络犯罪数量的激增，而国家内部乃至国际社会尚未针对这类犯罪活动构建起一系列打击犯罪活动的工具、规范和组织。参与联合打击犯罪活动的国家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国家安全问题、刑事司法制度差异、对政府滥用权力的担忧等等，都使跨国开展网络安全合作受到了阻碍。

推进外资持有和控股数字行业的垄断型企业，可以扩大垄断租金的共享范围，调整激励机制，实现全球经济取得更好的成果，阻止贸易冲突。但前提条件是开放金融或资本账户，允许外资持股控股，参与公司治理来实施控制，加强外企产权保护，对国家安全的领域予以严格限定等。

就监管政策问题而言，如果政府考虑拆分国内的大型科技公司，以减少其垄断利润，或者管制其价格，理想做法是多国协同行动。如果无法做到多国步调一致，可能会削弱其他国家在本国采取行动的积极性。倘若只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采取了强有力的监管措施，而其他国家的垄断企业可以自由竞争，那么，该国就有可能在技术和市场竞争中落后于他国。

同样，如果各国能够协调行动，共同引入数字税，效果会更加突出，也会在各方眼中显得更加公平。科技巨头通过网络，跨境销售商品和服务，并从中获利，但又无需在国外建立大量实体商业存在，根据现有国际税收协议的规定，在买方管辖范围内

几乎不需要缴纳所得税。这为它们提供了税收套利空间，同时，也营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全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刻

在国与国之间互不信任、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国际合作寸步难行，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呼吁各方为数字时代重新展现布雷顿森林体系精神。在两次世界大战、贸易保护主义猖獗、大萧条等全球性危机过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促进引领世界各国形成了新的货币秩序。全球针对数字问题开展的合作，也可以采用同样的办法，就解决问题的重大原则和共同制度达成共识，例如，在上述领域内，帮助建立一个可预见的、开放的国际贸易框架。

另一个具体建议是建立一个类似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数字稳定理事会，负责制定共同标准、法规和政策；分享最佳实践；监测风险（Medhora, 2021年）。这将有助于保障金融稳定，使其免遭网络攻击，并促进全球各国在技术权利宪章、统一统计数字经济的数据、国际数据信任度等领域取得进展，以便收集和保障个人数据，例如用于医学研究等用途。

如果数字技术行业所提供的垄断租金仍然十分巨大，且网络战争被认为是未来安全冲突的主战场（这与人们的预期一致），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将会遭到各国国内的强烈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技术冲突将日益迫近，带来全球经济割裂、出现相关负面溢出效应等风险。而国际合作可以削弱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动机，有可能让各方获得更好的结果。但这需要各国持续努力，重建信任。FD

丹尼尔·加西亚·马西娅（Daniel Garcia-maci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经济学家，里希·戈亚尔（Rishi Goyal），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部助理主任。

参考文献：

Garcia-Macia, Daniel, and Rishi Goyal. 2020.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coupling in the Cyber Era." IMF Working Paper 20/25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9. "The Rise of Corporate Market Power and Its Macroeconomic Effect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pter 2. Washington, DC, April.

Medhora, Rohinton P. 2021. "We Need a New Era of International Data Diplomacy."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7.